

## 国家制造：晚近英模题材作品的新趋势

文.沙丹

如今，能把主旋律电影拍得好看已经很难，而英模题材影片，作为主旋律中最特殊的一类，想在口味多元的观众群体中博个彩头儿更是殊为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类作品有点像清水煮蛋，首先食材单一（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其次烹调方法也是亘古不变（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因此即便再是一流的厨子，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差不太多。当然，这还只是从生产创作的环节进行考量，再要说到传播与接受，英模影片与市场、主流消费群体严重脱节的现象便更为明显。

对此，学术批评界的观点往往充满“忧患意识”，如北师大两位学者田卉群、宋维才近年的研究便很有代表性。田卉群着重分析了英模影片中人物塑造模式存在的问题，她指出“通过儒家传统、苦情模式塑造出来的主流英模形象，多少有些惺惺作态。他们是时代的主流阶层，是被监督的对象，在分工日益明确、政府愈来愈注重服务性功能、受过教育的民众普遍要求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当代社会，传统的‘苦情’式公仆形象不再被主流观众所期待。”<sup>1</sup>宋维才则从英模电影运作和接受的层面，精辟地分析了孕育这类影片的“怪圈”（易融资，易投拍，高获奖率，政府市场），并指出“这个怪圈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电影生产中的投机心理”<sup>2</sup>。

上述观点，笔者均表示认同，如果说略有遗憾的地方，便是他们在指出英模电影发展的各种症结的同时，没有（或极少）提出缓解矛盾的方法。因而，笔者在此想借着近期英模电影发展的一些新趋势，简要地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正如宋维才在论文标题中发问“英模电影路在何方”——听起来，似乎感觉英模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奠定“焦裕禄模式”后便一直原地徘徊、少有突破，以至今天四顾彷徨。但从实际生产情况看，近期的英模电影不减反增，而且很多还活得蛮滋润的。这说明英模电影还自有其存在价值，理由不外乎：一，政府的意识形态需要。这种需要保证了英模电影的生产与产业化大潮并行不悖，并使之借助体制内的力量自给自足；二，制片厂自身的需要。尤其很多国营老厂，面对无法适应市场机制、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英模电影投入上的低门槛、文化上的“政治正确”以及各类政府评奖认可，已成为他们最为倚重的救命稻草。

老制片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受着不可阻挡的转企改制压力，这本要求他们将电影更多地视为大众通俗文化消费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恰恰反倒需要借助最富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英模电影生产完成自我救赎。在这看似吊诡的现状背后，起到核心支配作用的，说到底还是党和国家多年一以贯之的一元化指导思想。所谓“一元化”就是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党立国之根本，它肇始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反映在电影界，突出地表现在1949年后“人民电影”的改造完成。如学者启之所指出的，“一元化”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和艺术规律，要求“思想方面的高度统一性”和“艺术方面的高度规范性”都要落实到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上面。<sup>3</sup>它与管理体制的“一体化”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电影的商品属性，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譬如，按照“一元化”的要求，在判定何为英模人物时，武训这样的人物肯定是不合要求的，不仅不能歌颂，还要反对，因为他“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sup>4</sup>。

实事求是地说，“一元化”背后的工具论属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动摇。中宣部理论局在2009年出版的《六个“为什么”》里便指出“多样并存，一元指导”的重要性，“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sup>5</sup>。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英模电影势将继续并长期地存在下去，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代表形式。看来，它不仅没有“路

在何方”的迷茫，反倒有些“大道如天”的惬意了。当然，英模电影的题材选择也会随着中央指导思想侧重点的变化做出适时的调整。譬如，近年党和政府所大力倡导的主导精神是以为人为本，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于是，几部以优秀信访干部为原型的影片便应运而生，如八一厂拍摄的《情暖万家》、辽宁厂推出的《潘作良》等等，体现出政府试图修补近年上访过程中干群矛盾凸显的意图。

同时，针对英模电影传播失效的问题，新的应对措施也随之产生。主要体现在，在重点英模题材作品的运作过程中，中央主管部门直接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如此，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一线制片工作提供良好保障。以目前正在紧张后期制作中的献礼影片《杨善洲》为例。杨善洲生前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清正廉洁，一心为民，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 22 年，最后将价值 3 亿元的林场无偿捐献给国家。在中央看来，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的今天，杨善洲的先进事迹对于广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尤其有着突出的示范意义。<sup>6</sup>

3 月 20 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组部追授杨善洲“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次日，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活动；29 日，杨善洲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此同时，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紧密部署下，接受拍摄任务的天山厂主创团队已经奔赴云南保山施甸县采风。4 月份，在 7 个编剧夜以继日地推敲打磨、六易其稿后剧本通过，李雪健、奚美娟、李晨、小陶虹等大批知名演员确定加盟。5 月 1 日，剧组正式开机，月底顺利完成拍摄工作，现已定于“七一”档期在全国公映。粗略算来，整部作品从前期立项、调研到最终完成拍摄、审查、发行等流程，仅仅不到 3 个月，这对于其它任何正常立项的商业影片来说几乎都是难以想象的，真正凸显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竞争力、高速率的“制度优势”。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由此来看如今的英模电影的运作，着实如此。

那么，如何对上述电影生产行为作出新的定义？似乎，无论用过去常用的“主旋律电影”，还是近来学术界热衷使用的“主流电影”都无法凸显其特色。笔者认为，或许用“国家电影”的称呼会更准确一些。这个概念笔者最早见于著名导演叶大鹰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在畅想 2020 年中国电影生态时指出，会有一种“国家电影”的生产模式出现，这种影片是“中宣部、广电总局为了国家的政治文化需要，出资委托专业单位制作发行，大部分采用投标方式进行”，它会“摒弃传统‘主旋律’概念，好看程度不亚于通常的商业片，其制作和发行规模会空前巨大，对观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sup>7</sup>。其实，主旋律本身并没有错，各个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需要，都要用主旋律去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在表现方法上，以往太多的国产主旋律过于刻板 and 单一，陷入了简单化、模式化和说教的泥沼，以至于害得“主旋律”无形间成了一个贬义词。我想叶大鹰这里所谓的“国家电影”，强调得也正是一种真正实现“三性统一”的非产业化的国家制造行为。

这种“国家电影”的实践，实际上在今天已见曙光。譬如中影近来相继投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都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凝聚了上百位的一线明星，它在运作营销中充分地借鉴了各种产业化的手段，但需得承认，这终究不是一种可资借鉴推广的市场行为。在它们波澜壮阔、星光灿烂的影像背后，到处是一张张充满魔力的手。正是经由这些凝聚行政力的大手推动，“国家电影”才得以从梦想照进现实。而单就英模电影而言，《建国大业》的成功实质上也为这一片种带来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逐步改变了它在我们印象中朴素、粗糙、刻板、说教的原初印象。这当中，陈国星执导的《第一书记》堪称近年来英模电影的翘楚之作。

《第一书记》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基层干部沈浩的事迹为蓝本，叙述了他为群众致富来回

奔走，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事迹。在这部作品的运作过程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对于沈浩事迹的宣传有着极其缜密的策划和布置，电影只是手段之一，其它还有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电视剧、歌曲、黄梅戏、现代戏、图书等，多种形式拧成合力，充分达到最佳的社会宣传效果<sup>8</sup>；其二，电影《第一书记》的拍摄工作中由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办公室宣传组直接负责，具体拍摄委托紫禁城影业完成；其三，在英模电影中最早地打出“星海战术”，除了由杨立新担任主角外，徐帆、王刚、刘威、黄素影、宋丹丹、蒋雯丽、何冰等十五位观众熟悉的一线明星加盟。以上种种，让《第一书记》初步具备了“国家电影”的身份特质。

说完外因，从电影自身来看，《第一书记》也有相当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它摒弃了英模电影惯用的“思想高起点”的路数，将沈浩还原为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英模不是皇帝的儿子，生来就是龙种；沈浩的觉悟也不是天生的，他之所以奔赴小岗，首先取决于个人价值实现的要求，这种处理在今天的观众看来便容易令人信服。其次，不说教，不空喊口号，不刻意煽情，中正平和，纪实性与抒情主义的调子完美地结合。最后，精英化的团队配置保证了《第一书记》一流的视听呈现（编剧、摄影、音乐较一般英模影片尤显出色），明星大腕们的客串也八仙过海各显魅力，或喜或悲，或调侃或撒泼，真正起到了“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效用。

尽管《第一书记》的成绩令人欣喜，但从宏观面来考量，英模电影确实还存在着很多明显的弱项。比如，英模电影普遍存在着电影化水平欠佳的弊病。这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工艺无法与时俱进的缘故。试想，如果电影的技术水准不过硬，拍得没有“电影感”，观众为何不去选择更廉价的电视新闻（它比电影更真实）？还有，英模电影普遍存在戏剧性冲突不足的软肋，很难借鉴类型化的技巧加以弥补。英模人物不是领袖人物，他们扎根基层，身上缺乏传奇性，因此这类作品多使用“散点透视”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日常琐碎事件的堆积来关注他们的人生。像宋江波的《潘作良》便是此种情况，仔细分析影片的叙事脉络，会发现影片几乎就是一部《焦裕禄》的翻版，缺乏新意；同样由他执导的《大道如天》，没有了“真人真事”的桎梏，全片便可以围绕一件矿难事故为核心，充分调动惊险悬疑的类型模式。张瑜饰演的公安局长既是人民公仆，也是胆大心细的“女版狄仁杰”，观赏程度显然要好得多。此外，困扰英模电影的，还有专业技能的陌生化问题。这主要指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袁隆平》和《邓稼先》之类。这些人物多为理性隐忍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尖端的高科技和国防机密，那么如何能把这样的故事讲述得让普通观众听得懂、乐意听，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英模电影“国家制造”的发展趋势，笔者也想谈几点对于这一片种的未来期望。首先，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紧扣社会热点，力求实现“人事并举”。长期以来，到底是写“人”，还是写“事”一直是困扰英模影片创作者的一个症结所在。刘云山同志曾指出：“影视创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塑造形象，人生感悟需要人物故事来承载，思想价值需要艺术形象来表达。如果没有血肉丰满的形象，人物脸谱化、概念化，就难以吸引观众、产生感人力量。”<sup>9</sup>在这点上，近年来的《张思德》、《铁人》、《第一书记》等都已做得较好。在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基础上，英模影片要想百姓之所想，把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事”表现出来。这实际考验的是编导者的选材、剪裁能力。当年《离开雷锋的日子》和《生死抉择》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就是因为它把英模的人物塑造和百姓切身关心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英模的形象只是一个个体，英模与时代、受众的紧密互动才是真正可以深挖的精神宝藏。

其次，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针的基础上，更多地调动视听手段，丰富影片的形式和内涵。现实生活是电影创作的源头活水。但电影中的现实生活，不是机械的复写，不是自然主义的拷贝，它应当高于现实、贯注理想。因此，英模电影在叙事手

法、电影语言、导演技巧等方面都亟待更新。比如，《袁隆平》里在描述主人公美好的愿景时（在水稻下乘凉，水稻可以像花生米这么大），能否充分运用想象力和数字技术，把它拍摄得鲜活有趣一些？在刻画英模形象的时候，能否借鉴类似《公民凯恩》的叙事技巧，把人物刻画得立体多面一些？近期的一些出色的虚构类主旋律电影，如戚健的《天狗》和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通过出色的导演构思调度，已经彰显出不同以往的风格化和感染力。即便英模电影必须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承担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但这也并不妨碍创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施展个性的才华。

最后，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笔者最近一直在研读《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一书，对于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俞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指出，国家政改的突破口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政治的话，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作为有 7800 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英模电影的主人公们正是这些精英中最突出的代表）。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这也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专门强调的。只有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更加公平正义，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才能更和睦——这正是英模电影在新时期肩负的终极使命，也正是基于此，笔者有理由相信，“国家制造”必将成为未来英模电影创作的主流模式。

---

<sup>1</sup> 田卉群《分裂的主体与停转的宇宙——试析英模传记片人物塑造模式存在的问题》，《电影艺术》，2009 年第 6 期，第 73 页。

<sup>2</sup> 宋维才《“英模电影”路在何方？》，《电影艺术》，2008 年第 1 期，第 54 页。

<sup>3</sup> 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台北：秀威资讯，2010 年，第 2 页。

<sup>4</sup> 毛泽东《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年，第 109 页。

<sup>5</sup> 中宣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 年，第 12-13 页。

<sup>6</sup>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党建》，2011 年第 5 期，第 4 页。

<sup>7</sup> 叶大鹰《“主旋律”电影会成为历史》，《中国经济周刊》，2010 年第 2 期，第 26-27 页。

<sup>8</sup> 刘汉俊《体验崇高，塑造丰碑——电影〈第一书记〉暨图书〈沈浩日记〉策划过程》，《求是杂志》，2010 年第 15 期，第 50-51 页。

<sup>9</sup> 刘云山《创作更多深受群众喜爱的影视精品》，《光明日报》，2010 年 09 月 30 日。